

李紱的氣象與學術及其對當前國人德行修養之啓示

黃文樹

(樹德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摘要

本文兼採文本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探析李紱的人格氣象與學術取徑，並提出其對當前國人德行修養之啓示。李紱是清初陸王學者第一重鎮，人品操守為滿漢中所少見。他自小尚志行，畢生人格氣象俊偉。其學術，在尊朱黜王時局中，堅走王學路線，汲取並發揚心學精華，特別就躬行實踐著力發揮，將心學事功化，體現出思想卓然自主有成之特點。對於當前國人的德行修養，李紱的人格氣象與學術取徑，可有五項啓示：一是樹立一個為人光明磊落之典範，二是提供一個任官清廉自守之楷模，三是啓發一種做事勇猛無畏之精神，四是指引一條治學求真篤行之方向，五是揭示一項道德之事功化之理念。

關鍵詞：李紱、清初、人格氣象、學術、陽明學、德行修養



Meteorology and Academic Studies of Li Fu and His Enlightenment toward the Moral Conducts Accomp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Today

Huang, Wen-Shu

Professor of STU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Abstract

The paper adopts both textual analysis method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ersonality meteorology and academic access path of Li Fu, and proposes his enlightenment towards the moral conducts accomp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today. Li Fu was the first important follower of scholars Lu Jiu-Yuan and Wang Yang-Ming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 high moral quali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of Li Fu were rarely found among the Manchurians and the Hans. Since childhood, Li Fu had the ambition of doing good deeds. In his whole life his personality meteorology was profound and lofty. In those days that people commonly showed respect for Zhu Xi but despised Wang Yang-Ming, Li Fu firmly followed the route of Wang Yang-Ming, absorbed his thinking, and spread the essence of Yang-Ming School of Mind. He particularly endeavored to focus on personal practices, and realized Yang-Ming School of Mind in daily life, embodying his characteristics of outstanding thinking and independent success. Towards the moral conducts accomp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today, and the personality meteorology and academic access path of Li Fu, there are 5 items of enlightenment: the first one is establishment of a model of an aboveboard person; the second one is provision of a model of incorruptible and self-disciplined official; the third one is inspiration of a kind of courageous and fearless spirit in doing things; the fourth one is guidance to a



direction for academic studies, and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truth; and the fifth one is elucidation of an idea of practicing moral acts.

Keywords: Li Fu, early Qing Dynasty, personality meteorology, academic, thinking of Wang Yang-Ming, moral conducts accomplishment



一、前言

明清鼎革之後，學術思想朝向考據學及經世致用的路徑發展，理學漸趨式微。誠如張麗珠〈理學在清初的沒落過程〉一文所指：就程朱理學言，康熙帝為重整綱紀，提倡程朱理學；以朱子思想為官方哲學的考試政策，也一直沿襲未變。只不過，清廷之推尊程朱，有其藉思想統一以遂鉗制思想之政治目的。理學中的思辨色彩，則是摒棄在外，使得程朱理學的學術生命被扼殺，而步上理論貧乏的難以賡續之路。另就陽明心學言，一則在清廷獨尊程朱學之下，發展空間遭受嚴重阻滯；復在「空談誤國」的各方面集矢下，修正其學風為轉趨經世徵實。此外，喋喋不休的朱、王之爭，在清初也各自轉向經典的支持，如此一來，更加直接地推動了清代的經典考證之學。至此，理學退居伏流，而方興未艾的考據學，則取代其主流地位且蔚為風潮了。¹

縱然清初學術方向出現轉折，陽明學地位大幅滑落，但仍有認同陽明思想、傳承陽明精神的學者在。梁啟超（1873-1929）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提「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修正」²，即就此簡述。李紱（1675-1750）便是其中一佼佼者。

《清史列傳·李紱傳》稱許李紱「人品操守為滿漢中所少」³。李紱獲有進士功名，歷任中央及地方要職，又撰寫諸多著作問世（參後），既是當時大官，又是知名學者。由於李紱行政實績和學術思想皆豐碩，故趙爾巽（1844-1927）《清史稿》⁴、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學案》⁵、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1895-199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⁶、楊向奎、冒懷辛《清儒學案新編》⁷、潘富恩、徐洪興《中國理學》⁸等，莫不闢專章或專節述論李紱，足徵其在學術史之重要性。此外，晚近學界，也有若干人注意到李紱的學行⁹，

¹ 張麗珠，《清代新義理學》（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53-54。

² 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頁45-58。

³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清史列傳》（臺北：中華書局，1983年），卷15〈李紱傳〉，頁7。

⁴ 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⁵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⁶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⁷ 楊向奎、冒懷辛，《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

⁸ 潘富恩、徐洪興，《中國理學》（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

⁹ 這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王崇峻〈雍正大臣李紱的性情與思想〉（《鵝湖月刊》第31卷第8期，頁25-32）、



但同時條理其氣象與學術的研究，極其罕見，不無遺憾。職是之故，本文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輔以歷史研究法，針對李紱的氣象與學術加以探析，並由觀點之延展提出其對於當前國人德行修養的啟示。

二、李紱的人格氣象

李紱¹⁰，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今撫州)人。生於清康熙十四年(1675)，卒於清乾隆十五年(1750)。《清史稿·李紱傳》云：「少孤貧，好學，讀書經目成誦。」¹¹清儒昭槁(1776-1892)《嘯亭雜錄》亦載：「李侍郎紱，性聰慧，少時家貧，無資買書，乃借貸於鄰人，每一翻繹，無不成誦。」¹²依《清史列傳》卷十五〈李紱傳〉，李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選庶吉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雲南鄉試正考官、浙江鄉試正考官)、內閣學士、左副都御史兼學士(充會試副考官)、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廣西巡撫、直隸總督等職。¹³著有《穆堂初稿》、《穆堂別稿》、《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象山先生年譜》等書傳世。

李紱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內而卿貳，外而督撫，皆勇於任事。清初儒者全祖望(1705-1755)嘗謂：李氏「盡得江西諸先生之裘冶，……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¹⁴此處「江西諸先生」，指的是吳迂齋、吳岸、游裕、洪橫秋、吳碌等人。李紱回憶童少時期受教於里中諸先師的學習經驗云：

姜義泰〈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興大中文學報》第22期，頁339-370)、黃進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楊朝亮《李紱與〈陸子學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等。

¹⁰ 有關李紱的生平，可參見：《清史稿》卷293〈李紱傳〉、《清史列傳》卷15〈李紱傳〉、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陳小輝〈李紱年譜〉(《東華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4期，頁301-308)等。

¹¹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293〈列傳八十·李紱傳〉，頁10321。

¹² 清·昭槁，《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10〈李巨來夙慧〉，頁313。

¹³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清史列傳》，卷15〈李紱傳〉，頁1-7。

¹⁴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9。



余年十歲，時戲以其意為詩，匿不敢示人。十一歲始得律詩粘背之法於蒙師吳迂齋先生。

明年遂大為之。因與里中諸先生為詩社，諸先生皆丈人行，迂齋先生年六十一，吳登于先生名岸年五十六，游十洲先生裕，洪獅山先生橫秋，年皆四十二，吳湖山先生礪最小猶年三十六，而予以十二齡童子與焉。¹⁵

他又在〈歲貢生游公巖峰先生哀辭〉說：「顧自庚午歲（康熙二十九年，1690）請業公長嗣十洲先生，謬得幼慧名。」¹⁶由這些史料可知，李紱成長過程中，確實得到了吳迂齋、游裕等老師的栽培，而他也沒齒未忘師恩。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全祖望對李紱的人品操守之論定。全氏說李紱「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這是極高的評價。「荆公」即被梁啟超定位為「中國六大政治家」¹⁷之一的王安石（1021-1086）¹⁸。至於「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也是一種強烈的尊崇。楊文節即為《宋史》稱「為人剛」、因憂國而卒、臨終前書「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¹⁹的楊萬里（1127-1206）²⁰。

與全祖望見解相近，梁啟超說李紱「氣象俊偉，……他辦事極風烈而又條理縝密，但賦性伉直，常觸忤權貴，所以一生風波極多。暮年卒以錮廢終，而其氣不稍挫。」²¹錢穆亦相應稱許李紱為人，「磊落俊偉，光明簡切」。²²王崇峻也呼應道：李紱的立身行事，「卓然自主，無所瞻顧」，符應了顧炎武（1613-1682）「行己有恥」的主張。²³

¹⁵ 清·李紱，《穆堂初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421、1422冊，1996年），卷2〈小山吟〉，頁228。

¹⁶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48〈歲貢生游公巖峰先生哀辭〉，頁146。

¹⁷ 清·梁啟超，《中國六大政治家》（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

¹⁸ 王安石，自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荆國公。世人又稱王荆公。北宋撫州臨川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其生平可參見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327〈王安石傳〉，頁10541-10553。

¹⁹ 元·脫脫，《宋史》，卷433〈楊萬里傳〉，頁12870。

²⁰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南宋江西吉水人。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一生力主抗金，收復失地，以正直敢言，終身奉行「正心誠意」之學。後因奸相韓侂胄（1152-1207）專權辭官居家，隱居十五年不出，開禧二年（1206）憂憤而死。其生平可參見元·脫脫，《宋史》，卷433〈楊萬里傳〉，頁12863-12870。

²¹ 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57。

²²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84。

²³ 王崇峻，〈雍正文臣李紱的性情與思想〉，頁30。



究竟李紱的生平有哪些氣象俊偉、光明磊落之行誼？以下依序列舉五個例證說明之。

其一，康熙三十四年（1695），李紱二十一歲時與知友故人共組文社，曰「將社」，他在〈將社說〉云：

將者，進也，漸也，助也。學必求益。……顧今之為學者，舉業而已耳。舉業之用，求富貴利達而已耳，其志甚卑，不足以言學。吾少與吳子博君、游子昆源同學，頗以志行相尚。……又二十一補弟子員，識周子玉上，乃相約為文社，而問名于余，余應以「將」，則咸曰善。……吾輩數子者，積文樹行，以復昔人之大業，以應國家之景運，內喉舌，外蕃宣，無不可者。²⁴

由此文可見，李紱早年即與友人以志行相砥相礪，超越了一般學子專注舉業求富貴利達的窠臼，將「樹行」——樹立德行做為學習之重要指標。

其二，康熙三十七年（1698），李紱二十四歲起採取宋明理學修養功夫，並劃省身格，每天自我點檢，希做到日益向上精進。他說：

二十四歲復思向上，刊一省身格子，日逐點檢。惟居處恭三字，終不能學，又復中止。

自是以後時作時輟，惟大節未敢放寬。……閉門思咎，始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六、七年來，細閱周、程、朱、陸、陽明六子之書，各不下十數過，稍稍身心體念。久之，若有所見。²⁵

上面「居處恭」，語出《論語·子路》，其文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²⁶居處恭，即平常獨居，當

²⁴ 清·李紱，《穆堂別稿》，卷9〈將社說〉，頁257。

²⁵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43〈答徐編修畫堂書〉，頁81。

²⁶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年），〈子路〉，頁146。



做到不惰不放肆。對此，李紱坦白學不到這一功夫，但並不因此放寬修養大節。同時，他勤於研究周敦頤（1017-1073）、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3）、王陽明（1472-1528）等宋明大儒的功夫論，並長時體驗於身心，而有所領悟。

其三，雍正四年（1726），李紱五十三歲。據《清史稿·李紱傳》載，這年他由廣西巡撫赴直隸總督任，路過河南。因先前左都御史蔡珽（?-1743）薦起其故吏黃振國授河南信陽知州，忤巡撫田文鏡（1662-1733）。田氏當時是皇帝的寵信，馭吏嚴，尤惡科目，劾黃氏貪劣。本來此事不關李紱，但他過河南時，詰田氏胡為有意蹂躪士人，到了北京乃彈劾田文鏡。田氏不甘示弱，密疏奏李紱結朋黨。至雍正五年（1727），引發議政大臣會鞫李紱罪凡二十一款。²⁷

那時李紱被議處死刑，甚至雍正帝還為此事召集廷臣親自詰問。全祖望在〈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有下列評述：

獄成，世益為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晝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

時故甘撫胡君期恒亦以事在繫，歎曰：「真鐵漢也！」……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之，而復用之，乃大召廷臣，並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為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²⁸

這段牢獄生活及審訊過程，充分彰顯李紱臨危不懼、言論諤諤、浩然正氣、剛正不阿的伉壯性格，令人肅然起敬。其氣勢較之王陽明當年受廷杖²⁹時毫不遜色。結果是雍正帝以李紱「情詞懇切，且其學問尚優，命免死，纂修《八旗通

²⁷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 293〈李紱傳〉，頁 10323-10324。

²⁸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 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 315-316。

²⁹ 正德元年（1506），陽明任兵部主事。當時權宦劉瑾（1451-1510）竊柄，逆其意者多逮繫詔獄，陽明首抗疏相救，亦下獄，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詳見《王陽明全集》卷 33〈年譜一〉，頁 1227）其義憤可參見他的「獄中詩十四首」（同上書，卷 19，頁 674-676）。



志》效力。」³⁰可見，李紱堅毅的人格氣象和不同流俗的學術，確有感動人的力量。

其四，全祖望曾記載李紱一段不容情面批判巨宦貪黷的事蹟：

嘗有中州一巨公³¹，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象山）之學，非不岸烈，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³²

李紱的面折，雖近乎刻薄之譏評，非儒者篤厚之風，但確實鮮明地反映了他的秉心持正。

李紱自身是相當廉潔的，前述雍正五年（1727），他被定罪二十一條，「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³³又他任官期間，「敝車羸馬」³⁴，清守自持。李紱曾賦詩自述：「貧者士之常，士貧節乃著。我性自倔強，一往不回顧。既無戚戚憂，亦鮮營營慕。」³⁵又說：「吾薄宦近二十年，迂拙飢困，未嘗有升米之祿逮親舊。」³⁶「內忝卿貳，外擁節鉞，未嘗求贏餘，長尺寸。」³⁷李紱這些廉儉、甘貧的美德與當時某些權臣之奢驕迥然大異。清代史料筆記《嘯亭雜錄》載：「近日某閣臣歷任封圻，……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氈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³⁸兩相對照，我們不能不敬佩李紱之德行修養。

³⁰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 293〈李紱傳〉，頁 10324。

³¹ 此一巨公，楊向奎、冒懷辛考察認為是張伯行（1651-1725），張氏河南儀封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六十一年（1722）任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是清初程朱學者（見氏著《清儒學案新編·李紱「穆堂學案」》，頁 559）。

³²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 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 316。

³³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 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 315。

³⁴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60。

³⁵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4 下〈倚閭〉，頁 254。

³⁶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26〈亡弟李巨方墓誌銘〉，頁 510。

³⁷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27〈亡妻徐氏墓誌銘〉，頁 513。

³⁸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 10〈權臣奢儉〉，頁 314。



其五，李紱撰文輒推風骨凜烈之可敬人物，尤對陽明學派中敢言直諫、有膽識、有擔當的伉壯英傑著墨最多，從中可見他的理想人格選擇。首先，李紱極度景仰陽明是一位在國家多事之秋能挺身而出、大有為的良臣。他在〈心性說〉一文指出：

整菴（即羅欽順，1465-1547），吾鄉之先達，而陽明為浙人，吾豈私所好於陽明者，然平心論之，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為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不敢為鄉先達諱也。³⁹

這段話，從批評羅欽順中襯托陽明在天下多故之際，不離事自全的仕宦風格。

李紱在另一篇討論堯舜事業的文章說：

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始著儒者之效，唐韓子、宋歐陽子用之不盡，濂溪、明道則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餘則雖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公出，始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儒之恥。⁴⁰

認為陽明的道德、文章、事功，均已冠絕當代，「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儒之恥」，居功厥偉。

對於陽明門下弟子，李紱也從人格特質表彰許多人。如他說：

親炙如鄒文莊，私淑如羅文恭，皆粹然無疵，一出於正。……陳明水、……劉晴川、……鄒忠介諸公之風節，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說，躬行心得，發名而成業者，未易更僕數。豈不猶賢於整菴輩、訓詁章句，闖然媚世，而一無所建立者乎？⁴¹

³⁹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18〈心性說〉，頁 409。

⁴⁰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45〈書程山遺書後〉，頁 104。

⁴¹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18〈致良知說〉下，頁 413-414。



文中鄒文莊，即江右王門鄒守益（1491-1562）⁴²。他是正德六年（151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初年，值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後來「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獨鄒守益上疏「言君臣交儆之義」，大義凜然，決世人未能決之疑，開世人未敢開之口，遂落職。⁴³時人說他：「發奸擿伏，剖析如見。」⁴⁴賦予積極評價。

羅文恭，即同為江右王門的羅洪先（1504-1564）⁴⁵，舉嘉靖八年（1529）進士第一（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嘉靖十八年（1539）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史載：「上（世宗）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1507-1560）⁴⁶、校書趙時春（1509-1567），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皇帝怒為咒他不起，「皆黜為民」，終身不仕。⁴⁷黑暗、殘酷的政治現實，使他們有志不獲聘。

陳明水，即同屬江右王門的陳九川（1494-1562）⁴⁸。正德九年（1514）進士，授太常博士。當時武宗欲南巡，陳九川連疏諫止，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直聲動朝野」⁴⁹，惹來要命的毒打，還是廷申面折，忠節熠熠，正氣凜然。

劉晴川，即劉魁⁵⁰，也屬江右王門。正德二年（1507）登鄉薦，嘉靖中歷知鉤州、潮州，所至潔己愛人，扶植風教。入為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時

⁴²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著有《東廓鄒先生文集》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 16

〈鄒守益傳〉、《明史》卷 283 〈鄒守益傳〉、清·孫奇逢《理學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卷 2 〈鄒守益傳〉、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學生書局，1965 年）卷 74 〈鄒先生守益傳〉等。

⁴³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6 〈江右王門學案一〉，頁 54。

⁴⁴ 明·王時槐，《吉安府志》（北京：中國書局，《稀見中國地方志叢刊》，1992 年），卷 24，頁 347。

⁴⁵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著有《念庵文集》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 18 〈羅洪先傳〉、《明史》卷 283 〈羅洪先傳〉、《理學宗傳》卷 10 〈羅文恭公傳〉、《國朝獻徵錄》卷 19 〈羅洪先傳〉等。

⁴⁶ 唐順之，是南中王門人物，字應德，人稱荆川先生，江蘇武進人。嘉靖八年（1529），會試禮部第一。歷官翰林院編修、兵部主事、太僕寺少卿、右通政。著有《荆川先生文集》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 26 〈唐順之傳〉、《明史》卷 205 〈唐順之傳〉、《國朝獻徵錄》卷 63 〈唐公順之言行錄〉等。

⁴⁷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8 〈江右王門學案三〉，頁 1。

⁴⁸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江西臨川人。著有《明水陳先生文集》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 19 〈陳九川傳〉、《明史》卷 189 〈陳九川傳〉、《國朝獻徵錄》卷 35 〈陳公九川墓誌銘〉等。

⁴⁹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35 〈陳公九川墓誌銘〉，頁 1450。

⁵⁰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江西泰和人。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 19 〈劉魁傳〉、《明史》卷 29 〈劉魁傳〉、《理學宗傳》卷 21 〈劉魁傳〉、《國朝獻徵錄》卷 51 〈劉魁傳〉等。



帝感方士言，建雷殿於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杖四十，入獄，創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⁵¹

鄒忠介，即鄒元標（1551-1624）⁵²，也是江右王門人物。舉萬曆五年（1577）進士，旋出疏以論張居正（1525-1582）「奪情」，受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江陵敗後，鄒元標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1521-1593，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親），忤觸權貴，降職南京刑部照磨。⁵³

僅從上面數位便可知，陽明門下後學，確實很多人都以氣節著名，他們的性格剛毅，敢於讜言正論，不避權貴，臨危不懼，予人印象深刻。李紱以他們為楷模，並身體力行。他曾謂全祖望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⁵⁴這番話，沒有泰山巖巖之氣象，應是講不出來的。

相對的，由於李紱向以高風氣節自期，故對於心術不光之輩便嗤之以鼻，如他就毫不留情地抨擊孫承澤（1593-1676）：

在明朝官至九列，家居京師，親見闖賊之亂，國破君亡，偷生忍死。晚年沉酣於富貴利達之場，毫而不止，蓋患得患失之鄙夫。⁵⁵

發奸讎伏，剖析如見，同時也映現他剛毅耿直、不能藏垢的性格。

三、李紱的學術取徑

⁵¹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9〈江右王門學案四〉，頁 50。

⁵² 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江西吉水人。著有《願學集》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 23〈鄒元標傳〉、《明史》卷 243〈鄒元標傳〉、《理學宗傳》卷 25〈鄒元標傳〉等。

⁵³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23〈江右王門學案八〉，頁 20-21。

⁵⁴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 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 317-318。

⁵⁵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45〈書孫承澤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頁 106。



在治學方面，李紱的學術取徑同其人格氣象相近，體現出一種獨立思考，自信自喜，不隨附主流之殊采。本文將李紱的學術特點，歸納為二項特徵：一是在尊朱黜王的潮流中堅走王學路線；二是強調聖人之學必躬行心得施於政事。

（一）在尊朱黜王的潮流中堅走王學路線

徐世昌在《清儒學案·李紱穆堂學案》云：

康熙中葉以後，為程、朱極盛之時，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趨嚮，皆定於一尊。穆堂獨尋陸、王之遺緒，持論無所絀。雖其說較偏，信從者少，要亦申其所見，不害其偉岸自喜也。⁵⁶

這勾勒了李紱頗具思想主體性的特徵。

比徐氏觀點更加篤定的是梁啟超，他對李紱等幾位屈指可數的清前期王學人物極表推崇，指出：

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前風，隨人毀譽，還有什麼學問的獨立。……清康（熙）、雍（正）間，王學為眾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學自任者，我們卻不能不崇拜到極地。並非有意立異，實則個人品格，要在這種地方才看出來。……據我個人的批評，敢說清代理學家陸王學派還有人物，程朱學派決無人物。⁵⁷

梁氏富瞻情感地由衷敬服李紱在尊朱黜王的時潮裏，仍堅走王學路線之特立學風。

同樣從清初學術的變革切入，以盱衡李紱的治學風格，錢穆認為，清初言朱學者，顧炎武、王夫之（1619-1709）、李光地（1642-1718）諸人唱於上，朱學被奉為正學而大顯，陽明學則遭到無情醜詆。這種情況乃激起「豪傑」之

⁵⁶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卷 55〈李紱穆堂學案〉，頁 2171。

⁵⁷ 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頁 58。



士李紱的「反抗」。⁵⁸錢氏指出，李紱重實學，深不喜專以讀書講論、尋章摘句為學，而謂其事由於朱子，故他以此斥朱子，亦以此推尊象山、陽明；故李紱於凡攻陸王者率致非難。錢氏結論：

李紱……以博聞強記之學為陸、王本心良知作發明，以考史論世為心性義理作裁判，學術經濟文章冶於一鑪。……以有清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鎮推之，當無媿矣。⁵⁹

另者，黃進興《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把李紱置於「朱陸之爭」的背景中，判定李紱這一清初陸王學者的重要戰士，是學者中反思當時學術與政治變化的一個典範。而且，李紱證明了一個致力於陸王學派的文人照樣可以身為官方學者在異族朝廷下任職。⁶⁰

上面學者一致肯定李紱思想勇於取徑已式微之陽明學，所透顯出自立不阿的學術風骨。

陽明學從興發到衰落，即陽明學派踐行學術活動，並引起廣大社會影響的時間，逾百年之久，亦即《明史》所言：「姚江之學，……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⁶¹此處扼要條理陽明學自崛起經盛行到遭批難而衰微的概況如下：

回溯有明一代，在中葉之前，朱熹理學獨霸天下，被奉為圭臬，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⁶²「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⁶³不過，到了正德、嘉靖之際，王陽明「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⁶⁴；「別立宗

⁵⁸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65-269。

⁵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83-284。

⁶⁰ 黃進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頁 2-3。

⁶¹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卷 282〈儒林傳序〉，頁 1。

⁶²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0〈姚江學案〉，頁 53。

⁶³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 1324 冊，1983 年），卷 35〈道傳錄序〉頁 49。

⁶⁴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 年），卷 18〈朱子晚年定論〉，頁 49。



旨，顯與朱子背馳」⁶⁵。他所高張的「心學」旗幟，以新穎性、突破性滿足了世人渴望新思想的需求，學術風氣爲之一變：「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⁶⁶明中後期，學術界呈現了由朱學轉折爲王學主導的態勢。

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詔贈陽明新建侯，謚文成⁶⁷；萬曆十二年(1584)，明神宗欽准陽明從祀孔廟⁶⁸。凡此都是王學達於極盛的標幟。

當時學者王世貞(1526-1590)云：「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⁶⁹點出了王學流行之史實。如按地域分，王門弟子包括了《明儒學案》所稱的浙中王門(浙江中部)、江右王門(江西一帶，含止修正門)、南中王門(蘇皖一帶)、楚中王門(湖北一帶)、北方王門(山東河南一帶)、粵閩王門(廣東福建一帶)、泰州王門(長江中下游沿海一帶)，以及《明學儒案》未提及的黔中王門⁷⁰(貴州一帶)等分支流派。這樣就出現了王門弟子「半天下」的局面。梁啓超撰文指出，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其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終結」五百年道學，「吐很大光芒」；陽明卒後，門生在朝者如江右王門鄒守益、歐陽德(1496-1554)，在野者如浙中王門錢德洪(1496-1574)、王畿(1498-1582)、泰州王門王艮(1483-1540)、羅汝芳(1515-1588)等人，「都有絕大氣魄，能把師門宗旨發揮光大，勢力籠蓋全國。」⁷¹

惟到了萬曆後期，由於王門末流如何心隱(1517-1579)、李贄(1527-1602)、周汝登(1547-1629)等人，或行爲太過張狂，或講學衝破藩籬，引起了反對派的反感與抨擊。東林學派領袖顧憲成(1550-1612)評論：

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束不足。當世人桎梏于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天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開，渾

⁶⁵ 清·張廷玉，《明史》，卷 282〈儒林傳序〉，頁 2。

⁶⁶ 清·張廷玉，《明史》，卷 282〈儒林傳序〉，頁 2。

⁶⁷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 36〈年譜附錄一〉，頁 1353。

⁶⁸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40〈誥命〉，頁 1542。

⁶⁹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年)，卷 25，頁 638。

⁷⁰ 黔中王門人物有席書(1461-1527)、王杏、李渭(1513-1588)、孫應鰲(1527-1586)、陳尚象等，他們是王陽明及弟子徐樾(?-1552)在貴州培植起來的。

⁷¹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



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競業。陵夷至今，議論益玄，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恥。⁷²

又云：「以考亭爲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爲宗，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爲，蕩者無所不爲。……與其蕩也寧拘。」⁷³一則批評王學易流於空疏浮誕，二則表示朱子理學較陽明心學爲宜、爲佳。此外，顧氏「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之法，自斯言始。」⁷⁴明批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之教言。

另一東林人物高攀龍（1562-1626）接踵而起，一方面質疑、排斥陽明心學，一方面認同、景仰朱子學。高氏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⁷⁵他說：

陽明先生於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⁷⁶

且謂：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⁷⁷

在他看來，陽明心學在「爲學」與「修養」的態度上，都有極大的弊病。

⁷²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臺北：廣文書局，1975年），卷3，頁62-63。

⁷³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3，頁63。

⁷⁴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東林學案一〉，頁51。

⁷⁵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東林學案一〉，頁70。

⁷⁶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東林學案一〉，頁84。

⁷⁷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東林學案一〉，頁86。



同為東林社群士人史夢麟，作〈性善說〉闢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之教言。⁷⁸他指出：陽明學派「率以當下指點學人」，表面上看是「最親切語」，但實際接觸其講學，卻發現他們「一味任其自然，任情縱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⁷⁹判定王學使人趨於下流。

由上面的簡述可知，陽明學派確為明末「清議所宗」、「洗滌乾坤」⁸⁰的東林學派所批評，這使其學術地位與聲望大為滑落。

至清初顧炎武出，對陽明學之批評火力尤烈。他說：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廟丘墟。⁸¹

又說：「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⁸²這裏，「今日之清談」、「近世喜言心學」者，即衝著陽明而言。其明斥者，如：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其在于今，則王伯安（陽明）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正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于後賢乎？」⁸³

痛詆陽明「迷眾之罪大」，「罪深於桀、紂」。⁸⁴

⁷⁸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60〈東林學案三〉，頁 5。

⁷⁹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60〈東林學案三〉，頁 5。

⁸⁰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58〈東林學案一〉，頁 47。

⁸¹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卷 7〈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頁 339。

⁸²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卷 18〈心學〉，頁 811。

⁸³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卷 18〈朱子晚年定論〉，頁 826。

⁸⁴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卷 18〈朱子晚年定論〉，頁 825。



接軌於顧炎武之論，清前期儒者陸隴其（1630-1693）專宗朱子，排斥王學為「異端」最力。陸氏指出：

明自洪（武）永（樂）以後，迄於成（化）弘（治），其君相之所奉以為政，學士之所稟以為式，曷嘗不宋儒之兢兢哉！故其治隆俗古，夔絕漢唐；無何，異端紛出，持身者流入於晉魏，講學者迷溺於佛老。以方正為迂闊，以傳註為塵腐，教弛俗敗，而宗社隨之。⁸⁵

又說：

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真氏……，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義。及明永樂時，又彙為《大全》，懸示於上，以為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間，至矣盡矣。

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靖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絕。⁸⁶

陸氏對陽明學撻伐力道有如此。

黃進興研究指出，康熙年間，朱熹在孔廟的排位已經升到「十哲」之列，地位等同於孔子十大弟子。相形之下，王陽明的祠位在西廡，位置要比朱子低兩級。這樣，孔廟內的等級排列不僅具有學術意義還具有政治意義。不僅如此，

⁸⁵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1325冊，1983年），外集卷4〈道統〉，頁7。

⁸⁶ 清·陸隴其，《陸稼書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9年），卷2〈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頁51-52。



像年紀稍前於李紱的閻若璩（1636-1704），甚至主張將王陽明排出孔廟從祀。⁸⁷雍正二年（1724），增祀孔廟的先儒有明中葉程朱學者羅欽順、本朝程朱大儒陸隴其等十三人，卻獨無一位陸王學者，陸王派衰頹之勢可見一斑。⁸⁸

在上面陽明學遭受極度詆毀的時代下，李紱卻逆向認同、推崇陽明，並汲取其思想精華成爲自己思想體系的一部分。

李紱敬重陽明，尤對陽明龍場悟道、啓迪黔中諸生等行誼特別佩服，吟詩〈王文成守仁〉如下：

露簡批鱗動九閭，蠻鄉天遣與斯文。法言屢折安宣慰，理學先傾席使君。
烏撒⁸⁹諸生方濟濟，龍場三死漫紛紛。名賢過此須增重，北望威寧起暮雲。

⁹⁰

李紱曾投下許多心力完成《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旨在樹立陸王心學的正統地位，他認爲王陽明是最能發揚象山學術，使正學光耀古今的人物。其〈讀陸子集仍用鵝湖韻四首〉最後一首可爲證：

騶國師承世所欽，元功首重正人心。七篇⁹¹義直歸三陸，萬古苔原共一岑。
下學已知能上達，後揚何必悵前沉。聞知渺濶誰當續，赫赫陽明曜古今。⁹²

王陽明主張人皆有良知良能，「心即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認爲心是天地萬物之主，謂格物致知，當向內「自求諸心」，不當向外索諸事物。他說：「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⁹³「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⁹⁴「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⁹⁵又

⁸⁷ 黃進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頁 115。

⁸⁸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頁 286-287。

⁸⁹ 烏撒，地名，明爲烏撒衛，即今貴州省威寧縣之地，轄有烏撒、烏蒙等六部落，多屬烏蠻之裔。

⁹⁰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11〈王文成守仁〉，頁 317。

⁹¹ 七篇指《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等。

⁹²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17〈讀陸子集仍用鵝湖韻四首〉之四，頁 381。

⁹³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2〈傳習錄中〉，頁 74。

⁹⁴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2〈傳習錄中〉，頁 72。

⁹⁵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2〈傳習錄中〉，頁 51。



說：「夫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也，……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闡而不達之處。」⁹⁶李紱循著陽明的思想之路，指出：「吾心自有良知。」⁹⁷「學重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⁹⁸且說：

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為重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⁹⁹

這裏，我們明白看到了陽明心學在李紱思想中的遞嬗和映現。

（二）強調聖人之學必躬行心得施於政事

李紱成長與從事學術活動的時代，是科舉制度極盛之期，他看到一般士子專務科舉時文，一意於章句之學與利祿之事，對於聖人之道不僅終身未能行，而且終身莫能知，認為問題甚大。他說：

自元明以來，科舉法行而後天下仍有不行之知。士子誦四子書粗識其影響，依倣摹擬作時文，為饜足富貴利達之具，其於聖人之道，終身未嘗行，亦終身莫能知。¹⁰⁰

科舉之弊，讓他深以為憾。

從中國教育史與中國政治史觀察，科舉制度自隋朝創制之後，就成為中國歷代王朝基本的考試制度和選舉制度，是皇朝官僚體制的支柱，也是一般人鯉躍龍門的捷徑。大體而言，科舉制度亦是以公平見稱，一般無權無勢人家的子弟，經由十年寒窗，也有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機會。此舉有促成社會流動，不致造成階級制度的功用。¹⁰¹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當代文化學者余秋雨認為，科舉考試內容概為「文學修養」與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發展產生

⁹⁶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頁42。

⁹⁷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18〈原學〉上，頁407。

⁹⁸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18〈原學〉上，頁404。

⁹⁹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18〈原學〉下，頁408。

¹⁰⁰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28〈高安縣學吳君墓表〉，頁539。

¹⁰¹ 黃文樹，《陽明後學與明中晚期教育》（臺北：師大書苑出版社，2003年），頁239。



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加重了社會的文明；同時，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¹⁰²

然而科舉制度之缺失亦甚夥，一者，用考試法掄人才，只能考察學識，無法考察德行；二者，科舉淪為統治者消弭知識分子不滿思想和行為的御用工具；三者，士子窮盡歲月於備考，僥倖於一日之得失，而忽略務實之學；四者，唐代以後，弊端漸多，如投刺、午謁、夾帶、代考等，使一些不學無術之輩亦有倖進機會，敗壞學風。特別是明中葉——成化年間，實施以八股文作為科場應試四書精義的文體之後，科舉之弊益加明顯。八股「其文略仿宋精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¹⁰³考試時必須依經據傳，代古賢立言，作者不許有自己的見解和新意，桎梏至極。

明末清初的科舉制度受到八股文的侷限，讀書人徒記時文，士習漸趨孤陋、偏執、投機。誠如明儒孫應鰲（1527-1585）所言：

今日士習，其體要微辭、正言精義不能偕通並用，徒取捷徑，以資發身。自四書、本經、《性理》、《通鑑》外，了無干涉。至於流弊之漏，且將全書傳注具屬棄擯，一篇一章之旨，理路道脈，不識所由入，徒記時文，演襲規格，裝綴起承，倒句換字，轉相牽合，敗壞文體，蠱惑心術，月異而歲不同。¹⁰⁴

稍後的謝肇淛（1567-1624）感慨士人沒首濡溺於科舉利祿，不復知修身行己之事。他說：

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今之號為好學者，取科第為第一義矣！……至於修身行己，則絕不為意也。¹⁰⁵

這段話說明了當時人「取科第」與「修身行己」倒置之甚。

¹⁰² 余秋雨，《山居筆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頁265。

¹⁰³ 清·張廷玉，《明史》，卷70〈選舉志二〉，頁1。

¹⁰⁴ 明·孫應鰲，《孫應鰲文集》（貴州：黔東南州志辦公室，1990年），〈教秦緒言〉，頁311。

¹⁰⁵ 明·謝肇淛，《五雜俎》（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13〈事部一〉，頁267。



到了清初，每下愈況，士子專務投機取巧，乾脆只讀預擬文章即程墨房稿，古人篤實之學風，蕩然無存。所謂預擬文章，就是請善寫八股文的名士，揣摩下次大考可能會出的題目，將它預先做了，賣給應試者。考生則把名士作的八股文，加以硬背熟記，臨考時即抄謄一番，便可僥倖中式。這叫代人「擬題」。所以顧炎武說：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于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答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異。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¹⁰⁶

上舉這些問題與缺失，應是相當普遍的，《(康熙)新會縣志》載：

(學校)教官不過具員，號舍竟為虛設。學使者，歲科考校惟論文藝，雖有修潔博習之士，無所用之。由是，士日濡首於八股之中，揣摩掇拾，以求科第而博富貴，即詩書六藝亦且視為贅疣，置之不講，而況求所謂明倫敦行者耶？嗚呼！此學校之所以日遠於古也。¹⁰⁷

不但學術教育淒微淒滅，一切人格教育、生活教育、情意教育、實務知能教育已置之不問。對於如此窘況，李紱憂心地表示：「自聖賢之學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¹⁰⁸他說：

古之教人必於學，其文禮樂射御書數，其行孝友睦姻任恤，其德智仁聖義中和，學之而有成，則司徒賓而興之，而齊治均平之材悉於是焉出。其後

¹⁰⁶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卷 16〈擬題〉，頁 732。

¹⁰⁷ 清·蘇楫汝，《(康熙)新會縣志》(北京：中國書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1992年)，卷 8〈學校〉，頁 192。

¹⁰⁸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18〈發明本心說〉，頁 410。



衰也，纂語言文字之末以弋取富貴，而毫無濟於天下。諺以無實用相警者，必曰書生。¹⁰⁹

他確實觀察到學風與世風之窳敗。對於那些「以治經為進身之階」、「區區講論於訓詁章句，於身心無與」、「甘心以求富貴利達為名」、「所業之經書，既得舉即棄之」等「流俗之人」，李紱深不以為然，明指這些人「豈可望其有所樹立於天地間也。」¹¹⁰

李紱另在〈修全州學碑記〉除了一再檢討當時學校教育之侷限，也呼籲大家一起體認設學教民之本意。他說：

顧先王所以設學教民者，近世寢失其初意，學之教不徒為科名爵秩之階梯也，何以修於身，何以見於世，出何以為名臣，處何以為良士，載在大學小學之教者可考也。諸生能實而踐焉，乃無悖於設學之初意。¹¹¹

從這碑記可看出其苦心與對學風興革之志。

鑒於上述這些亟待救治的弊病，李紱一方面肯定、維護、吸收陽明學，認為陽明能抗劉瑾、能誅宸濠、能靖粵西之亂，是真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有用「實學」¹¹²；一方面把陽明心學導向躬行實踐而後乃有心得。他說：「自象山陸子之教不明，士墜於章句訓詁者三百餘年。洎王陽明先生倡明絕學，然後士知有躬行實踐之功。」¹¹³充分肯定陽明崛起對於士人重獲躬行實踐之學的意義。

本來，陽明論「知行合一」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¹¹⁴未明確揭示知的來源。李紱認為透過力行，才能獲取知識，指出：「凡欲知『道』者，直須躬行而後心得。若止懸空考察，終無定見。不過望塔說相輪而已。」¹¹⁵他進一步說：「聖人之學在於躬行心得。由小學以至大學

¹⁰⁹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29〈修安福縣學記〉，頁 555。

¹¹⁰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36〈來復堂集序〉，頁 655-656。

¹¹¹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30〈修全州學碑記〉，頁 557。

¹¹²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18〈心性說〉，頁 409。

¹¹³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26〈文學劉先生墓志銘〉，頁 511。

¹¹⁴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1〈傳習錄上〉，頁 4。

¹¹⁵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18〈心體無善惡說〉，頁 416。



齊治均平之業咸出乎其中，此學之名與實也。」¹¹⁶又說：「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¹¹⁷且說：「余惟聖人之學，必躬行乃有心得，既有心得，然後施之政事文章無往不宜。」¹¹⁸凡此可見，李紱不僅將陽明的知行說作了發揮和修正，而且強調躬行實踐，強烈主張學問必落實於政事之上。

根據李紱上面對知行關係的說法，姜義泰認為李紱觸及了「行先於知」的觀點，這一思想傾向，「接近陽明」而「反對朱子」。¹¹⁹在知行關係上，朱子採「知先行後」，謂：「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¹²⁰又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知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¹²¹對於朱子的「知先行後」說，陽明不苟同地說：「近世學者分知行為兩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後行，遂致終身不行。」¹²²依陽明觀點，若必先「知」了然後才「行」，待「知」的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於是終身不行，同時終身不知。這並非「小病痛」。¹²³為補偏救弊，他乃有「知行合一」之論。

比姜義泰見解更為徹底，李玉娟確認李紱從陽明「知行合一」基礎上，另闢「行先知後」說，就認識論而言，李紱此一思想發展，代表王學經驗主義在清前期的新動向，亦即這一重行主義，將陸王學本有之「實行」觀導引到重視在客觀事物實踐的經驗知識上，從而反對未經驗證的純粹理論知識，明顯是陽明「知行合一」說的修正。¹²⁴

李紱是坐而言，起而行之人。舉例來說，《清史稿·李紱傳》載：雍正二年（1724）四月至三年（1725）九月，李紱在廣西巡撫任上，短短一年又五個月即興辦了許多實事，包括留心武備、關心邊疆建設、清理虧空、修《廣西通志》、

¹¹⁶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 36〈來復堂集序〉，頁 655。

¹¹⁷ 清·李紱，《穆堂別稿》，卷 24〈學言稿序〉，頁 412。

¹¹⁸ 清·李紱，《穆堂別稿》，卷 25〈巫進士古文序〉，頁 422。

¹¹⁹ 姜義泰，〈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頁 348。

¹²⁰ 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9〈論知行〉，頁 148。

¹²¹ 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9〈論知行〉，頁 148。

¹²²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32〈與道通書〉，頁 1207。

¹²³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 1〈傳習錄上〉，頁 4-5。

¹²⁴ 李玉娟，《李穆堂與清初陸王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摘要〉，頁 1。



復建宣成書院、興建義倉、重修鎮南關等，皇帝先後以「留心武備」、「秉公執正」、「辦理得宜」等嘉獎其具體政績。¹²⁵全祖望說李紱「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¹²⁶應是信而有徵的。

四、對當前國人德行修養之啓示

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¹²⁷意味透過學習與努力，人的氣質和行爲是可以向上向善的。三百餘年前的李紱，其人格氣象與學術取徑確有優異之風采。此處將其加以延展、引申，提出對當前國人德行修養之啓示，歸納爲下列五個層面：

其一，李紱爲我們樹立一個爲人光明磊落之典範

古賢的道德修養，有存心、養性、正心、誠意、養氣、集義、持敬、慎獨等修身功夫，希望透過這些方法存養自己本有的善性，並使之發揚光大，以培成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也。¹²⁸

有浩然正氣之人格情操者，對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明其道義，辨其是非，言行一有不合於道義，則自反不直，故心地必光明磊落，無所掩飾襲取。

但令人遺憾的是，古賢正心、誠意、養氣、集義諸觀念與行爲，在今天的社會裏，正瀕臨衰亡的邊緣。張光甫撰文指出：

¹²⁵ 清·趙爾巽，《清史稿》，卷 293〈李紱傳〉，頁 10321-10323。

¹²⁶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 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 316。

¹²⁷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里仁〉，頁 73。

¹²⁸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公孫丑上〉，頁 231-232。



經商的人，不再以誠信為榮譽，把仿冒、盜印視為當然，倒債騙財動輒千百萬，毫不羞恥。……許多年輕人游手好閒，拐騙搶殺作絕，不在乎羞辱祖宗的門楣。現在，連七老八十的媼婦，也逐漸跟進，扮起倒會潛逃的角色，鄙棄子孫的顏面於不顧。……至於各類考試的作弊風氣之盛，作弊方法的專精，已經成為教育活動中另一記惡招。¹²⁹

普羅大眾不光明、不磊落的行徑，歷歷在目。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曾於 1998 年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臺灣總體檢」實徵性調查。該研究報告指出，1996 年以來，國內連續發生重大刑案，使國人對社會風氣惡化、治安敗壞以及文化品質低落感同身受，絕大多數的國人都對當前社會現實、功利的現象感到憂心和不滿。調查結果顯示，有 76% 的受訪者認為我們的社會需要心靈改革。至於心靈改革要從何著手？有 33% 的受訪者主張「從每個人自身修養做起」，其次有 27% 主張「從教育改革做起」，再次 12% 主張「從恢復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做起」等。¹³⁰這說明自身修養、教育改革、傳統倫理諸項，從人格陶冶與修身教育等根本性方法切入以實施心靈改革，較諸採用「掃黑肅貪」（6%）這類末端問題出現後才懲以刑罰來得被看重。所謂治本重於治標，應是不虛的。

從「人」的殊勝及人格教育立場言，人的生活態度、精神、觀念與言行舉止等，其實是可以改變、調整的。釋印順（1906-2005）依佛法所言，人有三個殊勝，成為「五趣」眾生中「最難得」：即人在「智慧」上有「憶念勝」，在「慚愧心」上有「梵行勝」，在「堅忍」上有「勤勇勝」，構成所謂「憶梵行勤勇，三事勝諸天」。¹³¹人的心力極強，能修能證，故有健全人格之可能。前述李紱自我檢點志行，為人光明磊落，一以誠真為本，行己有恥，實足作為當前人們的典範。

其二，李紱為我們提供一個任官清廉自守之楷模

¹²⁹ 張光甫，《教育隨筆》（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6 年），頁 89-90。

¹³⁰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臺灣人的文化觀》（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8 年），頁 290-291。

¹³¹ 釋印順，《成佛之道》（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頁 90。



如前所述，李紱所處的時代，士子所學習者皆占畢文藝之事，所經營者概富貴榮肥之圖，一旦登第為官，很多人竟不知德行為何物，貪得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這些吏弊，此等貪殘，在今天還是時見報載，層出不窮。

人性的墮落，德育的失策，使權力腐蝕的問題益加嚴重。歐陽教愷切指出：

今天……德育上最大的一個缺陷，就是在教育上拚命地把「競爭」(competition)當作一個無所不能的教育手段，過分地鼓勵兒童青少年作無謂的競爭。有意義有價值的行為也競爭，無意義無價值的活動也照樣人為化地安排他們去競爭。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勝利者占盡所有的益處，特權也越大。因之，兒童青年也像成人社會一樣，好大喜功，希望能手握大權，主宰一切，發號施令。但是，學校裏卻沒有交代清楚「權力」的概念與運用原則，使他們踏入社會後，一旦權力在握，常濫用或惡用權力，作威作福。……

有不少權居高位的政客惡用權力，敗壞整個德育效果，這是最可歎的事。¹³²

這段解析，相當中肯，對於亟待匡正的問題作了深刻的檢討。

2006年，張光甫亦痛切道：

地方官吏不以勤儉為榮，往往官商勾結，貪求非分的財富，顯耀鄉里。一些機關大員尸位素餐者，假冒貸款，違法套匯，視國家榮譽為棄屣，中飽私囊。各級民代口口聲聲為民服務，有的卻包賭、包娼，專事不名譽的勾當。¹³³

這些觀察，與上面歐陽教的檢討，一致發現官場的醜陋。

數年前，曾經有一位中部某大學的大三學生撰文道：

臺灣教育教人萬般皆下品，唯有分數高，而就算分數高也不一定能賺大錢，要賺錢還得把人格拋棄。……臺灣人的自私世界聞名，我不反駁，因為我

¹³² 歐陽教，《德育原理》（臺北：文景出版社，1985年），頁384-385。

¹³³ 張光甫，《教育隨筆》，頁89。



就是這樣，我不相信沒有臺灣人的自私，會讓臺灣擁有今天的財富。……能讓我賺錢、賺名聲、賺權勢的就是好教育。……我只要有名有利，就算沒有人格又何妨！¹³⁴

像這樣向錢看齊，棄人格如敝屣的人，絕對不是少數個案。

社會趨於下流，固然由於人性的墜落、教育的失策等使然，我們實在缺乏人格模範，讓兒童、青少年，以及社會大眾引為學習楷模。李紱任官敝車羸馬，清廉自守，未嘗求贏餘的仕德，正是離今不遠的範式。

其三，李紱為我們啟發一種做事勇猛無畏之精神

前述李紱當面批評雍正帝的寵臣田文鏡；而在世宗於廷上色厲詰責時，他不屈不撓，一無乞憐語，為自己所認定對的事讜言辯護。又他不容情面指斥巨官權勢之貪黷，並未考慮可能遭到報復。他另盛推陽明學派敢言直諫、勇於任事的風格。而他本身中外履職，竭力辦理實事，取得豐碩之政績，在在體現出勇猛無畏之精神。

李紱做事勇猛無畏之精神，與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¹³⁵的奮鬥精神，前後呼應。孔子一生恂恂惶惶，周訪列國弘揚仁道，與一般人的冷漠疏離、敷衍塞責、自私自利之心態截然不同。梁漱溟（1893-1988）詮釋孔子的勇猛做事說：

平常人走計算的路，總要由手段取得目的。……孔子則不然。他原不認定計算而致情志繫於外，……他很勇猛的作事，祇是不出於打量罷了。所以他自已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旁人就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¹³⁶

梁氏看到了孔子做事出處的積極樣態。孔子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與前舉李紱「不動心於生死禍福」的信念同揆，都象徵一種強烈動機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¹³⁴ 陳玉峰，〈正宗土石亂流〉（《自由時報》2004年7月11日），頁15。

¹³⁵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憲問〉，頁158。

¹³⁶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83年），頁163-164。



前賢勇於任事的精神，意近今天的「敬業」精神。只可惜時下有很多人的工作態度是不夠敬業的。瞿海源曾語重心長地訴說道：

當前臺灣社會在職業倫理方面，確也顯露了一些問題。那就是「敬業」精神的不足。……

敬業……包括了對事對人的負責態度。舉例來說，……我們的產品品質管制不理想，有時也不能符合國外訂單的要求，多少有點敷衍塞責的味道，這就是不夠敬業的地方。在其他各個社會階層情形也多是如此。譬如，醫生們廢寢忘食的賺錢，但在醫德方面卻是不敢為人恭維。……目前，我們社會裏最嚴重的問題實際上還在於公務人員，以及公營事業的從業人員，既不敬業，也不勤勞。……總之不敬業是我們國內社會的通病，更是公務人員的大病。¹³⁷

這種不敬業的社會病的確需要矯治，否則政府效能之提高、工商管理之升級、產業技術之躍進、服務品質之優化等都將難以達成。

筆者認為，李紱做事勇猛無畏的精神，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的人們在工作或面對困難時不消極、不沉淪的重要力量泉源和精神支柱。

其四，李紱為我們指引一條治學求真篤行之方向

歷代學者流品是很複雜的，固然有中流砥柱，偉岸可尊者，但望風趨時、依草附木、貪名慕利者，更是所在多有。李紱從事學術活動的時代，這類隨人腳跟、趨炎附勢之輩便充斥其間。誠如清儒湯斌（1627-1687）所觀察：

姚江之學，……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

¹³⁷ 瞿海源，《汜濫與匱乏》（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8年），頁140-141。



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¹³⁸

當時人學術流向與學風日益澆薄有如此。

由前述可知，李紱探討學問的態度，與一般士人貪名慕利、隨聲附和、西瓜偎大邊的行徑，迥然有別。姑且不論他在《朱子晚年全論》、《陸子學譜》等以朱子學就象山學之是與非，或立意建構陸王學術正統地位之曲與直，他肯定自我內在良知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價值，質疑求真，以詳盡的文獻資料為基礎，考證辨析，而提出自己的主張和創見，這種治學態度和精神無疑是正確而值得效法的。

貪名慕利的學術研究者，古人多有之，於今也不例外。吳大猷（1907-2000）於1985年針對國內學術界研究風氣之窳陋，作了如下檢討：

令人痛心的是，目前一些教授級的學者專家，……數十年來，沒有什麼學有專長，能成為一代宗師的人物出現。……在爆發性的經濟進展中的社會，凡有藉穩定狀態而建立的水準，如社會道德、個人對其職守的忠誠等，多漸行衰退，而代以投機急利的態度。這個利字還不單指金錢，凡是有利於自己的事，都千方百計設法爭取。比如說，一個稍微好一點的，或是高一點的職位有了缺，於是便會有不少人去奔走謀取。要是傳出那兒有一個出國進修的機會，也會有人為了出國渡金，不是為了求知，而極力營求。這些都不是一個專心學術研究的人應有的心態。更有甚者，目前一些政府機構，或民間文化學術團體，常用「獎金」來鼓勵寫作、研究、或出國進修。這原是善意，但這也漸使一些人為了獎金而工作，改變腐蝕了學術研究的動機。這種以利相誘的辦法，後果是很嚴重的，深深的影響了淳樸的學術研究之風。¹³⁹

¹³⁸ 清·湯斌，《湯文正公（潛菴）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卷2〈答陸稼書書〉，頁384-386。

¹³⁹ 吳大猷，《教育問題》（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頁224-225。



這些話，對於我們今天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頗值得警惕。

此外，李紱思想反對口耳章句之學，側重學知過程之中及之後的躬行實踐，傳承、發揚了儒家優質的教育理論。孔子最常倡論如「仁」、「忠恕」，不光是要求人要有愛心、同情心，而且要求用行動來實踐愛心、同情心。孟子所標舉的「四端」說，一樣認為理想人格的造就全在於道德實踐，在於將自己天賦的善性推及他人。荀子〈儒效篇〉提出的「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也是對篤實踐行的強調。可以說，李紱之重躬行，與孔孟荀之重篤行，是一脈相承的。這種務實不尚空言的治學觀，仍然是今天我們該走的方向。

其五，李紱為我們揭示一項道德之事功化之理念

依前述可知，李紱之學，向重治理世事——「經世」，他認為「經世」應本著道德良知，付諸實際作為，且帶來具體事功。前述他極力表彰陽明亦植基於此。他說：

秋水先生謂堯舜事業，隨出隨處，皆有可施。不專指出身加民，斯言固然。然必天德發為王道，乃為盡明明德之量。孔子稱堯，亦稱成功文章。蓋聖德神功與雜霸功利不同。

且管仲之功，孔子亦稱之。乃謂唐虞治績不足邀儒者一盼，則亦過矣。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畎畝樂道，何如堯舜君民？修身見於世，特君子不得志之所為耳。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自程子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語，世儒藉口，輒欲以空言傲實績。不知程子就性分全量言之，自無窮際。

故曰：泰山之上，已不屬泰山。若腐儒撮土俱無，安敢藐泰山也哉？內聖外王之學，一變而為迂疏無用，至令天下以儒相警訾，皆此等謬說啟之也。

140

依其觀點，儒家兼重內聖與外王，講求經世濟世，並未忽略實業事功。李紱之推崇陽明著重功業，錢穆有如下一段精闢解說：

¹⁴⁰ 清·李紱，《穆堂初稿》，卷45〈書程山遺書後〉，頁104。



蓋陸王之學，既以躬行實踐為主，而躬行實踐，必歸鵠於功業濟世，乃為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足以證其踐行之圓滿而庶幾於無憾。此與從事章句訓詁，即於文字講論爭是非者絕不同。故穆堂盛推陽明，以其功業之發見，徵學說之虛實，此正陸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詣，絕非陷溺功利，偏心雜霸，空為此畔援之勢論也。¹⁴¹

可見李紱之盛推陽明，係因陽明能將良知義理推展於功業濟世之上。

可惜，「經世」應本著道德良知任事，並非當今多數人的行為準則。吳大猷曾針對時弊，特別是官員執行公務之病端慨嘆道：

（國人）文來的，貪贓枉法，投機取巧，鑽法律漏洞，找人事關係，行偽作騙，因而有了各式樣的「經濟犯罪」。武來的，乾脆訴諸暴力。……一個立法不周，執法不明，甚至於縱容一些人違法亂紀的政府，又那裏能糾正目前社會風氣？國家只有日見危殆。就以「十信」一案為例，早在十年前就已發現了「十信」的毛病，可是歷任財政首長，既沒有積極的採取處置措施，也沒有消極的去勸導防止，任其坐大，終於養癰成大患。……再談到「有毒玉米」一案。煙酒公賣局避重就輕，……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居然）有容許從泰國購進含黃麴毒素的玉米的事件發生；有容許這批玉米的違法散佈的營業；再竟有公營機構購買它來製酒，並售出酒槽與飼料商等事！總之，這「玉米」案，顯示了我們政府許多有關機構的無知、無能、無盡忠職責的心、無果斷處事的能力；顯示了一些人祇知牟利，不知法律、道德、良心。¹⁴²

這段評論，道出了執行公務官員鄙仁義、輕道德、昧良知的醜態與不堪的後果。這對照於李紱的剛毅氣象與事功化學術，當前國人實有徹底革心之必要。要言之，李紱認同、繼承陽明之教，進一步強調堯舜的君民事業，要求德性修

¹⁴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82。

¹⁴² 吳大猷，《教育問題》，頁 222-224。



養須能落實於天下四民之並治上，這其實是「心學事功化」¹⁴³概念，也是儒家「道德事功化」¹⁴⁴理想，對今日吾人之德行修養，意義依然深切。他啟發我們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以及公共事務不作壁上觀，而要盡力參與，投入其中，勇於承擔責任，本著道德良知做一番事業。

五、結語

綜上可知，清儒李紱，少孤貧，好學。登康熙四十年（1709）進士，選庶吉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廣西巡撫、直隸總督等。著有《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穆堂初稿》、《穆堂別稿》等書傳世。

李紱自小即尚重志行，畢生為人光明磊落，卓然自立。全祖望說李紱的堯舜居民之志不下王安石，剛腸勁氣大類楊萬里。《清史列傳》稱許李紱人品操守為滿漢中所罕見。梁啟超提出更具體、更有情感的評價：辦事極風烈而又條理縝密，但賦性伉直，常觸忤權貴，而其氣不稍挫。錢穆也有相近看法：雖意有所激，然磊落俊偉，光明簡切，是有清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鎮。李紱剛毅的人格氣象確有其偉烈之風骨。

本文列舉五證說明李紱之人格氣象俊偉。一是他年青時與好友共組「將社」，即相約砥礪志行，互期積文樹行。二是亦自年青時即劃省身格，每天點檢言行，自我要求日益向上向善。三是過了知命之年，面質皇帝寵臣田文鏡有意蹂踐讀

¹⁴³ 張麗珠〈清代新思想典範之曙光——以陳確、唐甄、顏元為線索〉（《文與哲》第16期，頁397-440），認為唐甄（1630-1704）《潛書》極具啟蒙精神，其中包括對於專制政權之批判以及含蓋君民平等、男女平等之思想萌芽。而其富利思想的經濟觀，也突破了傳統儒學所一向標榜的「廉吏」標準。張氏特別提出「心學之事功化」概念，指出唐甄服膺陽明之教，以「權」喻心，從強調心體能「權」的主觀能動性出發，反對執一無權和空喊口號，要求「心體性德」之修身須能落實在「天地萬物」之並治上。唐氏效法陽明習兵學、且善用兵，故主張儒生應與武事合一，以為兼備「仁、義、兵」三者始為「全學」，此即唐甄將心學事功化之思想例證。

¹⁴⁴ 何佑森〈清代經世思潮〉（《漢學研究》第13卷第1期，頁1-44），指出儒家之事功，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事功。他以陽明的事功為例，認為陽明的簿書訟獄、平宸濠之叛、定猺賊之亂等實事，是他本著良知之心成就的一系列「聖人事業」，此即儒家「道德之事功」。



書人，惹來一身禍，但他正色無所撓，言論諤諤，臨危不懼。四是他不容情面批評巨官貪黷情形，秉心持正，毫無所顧。李紱本身任官清廉自守，未嘗求贏餘，與一般權臣之驕奢大不同。五是他盛推陽明學派眾多敢言直諫的伉壯事蹟，表彰了本於社會良知的剛毅仕格。

在學術思想上，李紱成長與從事學術活動之際，是陽明學遭受抨擊、醜詆，而朱子學大獲推尊、優禮的時代，但他並不阿附主流，仍對陽明學抱持正向、積極的肯定態度，吸收、傳承其思想精華，並加以修正發揚。他表明，聖人之學求於內、求於本，映現了李紱與陽明思想遞嬗之跡。李紱同時認為，陽明倡明絕學，然後士知有躬行實踐之功。又強調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將陽明「知行合一」說進一步發揮為「重躬行」。

李紱反對口耳章句之學，批評世人心懷富貴利達之事。他期許士人要學真正足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有用「實學」，強烈主張學問必落實於政事之上。他是坐言而起行的人，其任官之具體實績相當多，贏得史家「濟時為急，用世最殷」之譽，名至實歸。

從李紱的人格氣象與學術傾向盱衡，他確實是一位可敬的人物。當代國人的德行修養，實有檢討與提升之處，李紱的氣象與學術，或可引為啓示：其一，李紱為我們樹立一個為人光明磊落之典範；其二，李紱為我們提供一個任官清廉自守之楷模；其三，李紱為我們啓發一種做事勇猛無畏之精神；其四，李紱為我們指引一條治學求真篤行之方向。其五，李紱為我們揭示一項道德之事功化之理念。



◎參考資料

一、傳統文獻（先按朝代先後，再依作者姓名筆劃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年。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年。

明·王時槐，《吉安府志》，北京：中國書店，《稀見中國地方志叢刊》，1992年。

明·孫應鰲，《孫應鰲文集》，貴州：黔東南州志辦公室，1990年。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學生書局，1965年。

明·謝肇淛，《五雜俎》，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臺北：廣文書局，1975年。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1317、1318冊，1983年。

清·李紱，《穆堂初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421、1422冊，1996年。

清·李紱，《穆堂別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422冊，1996年。

清·李紱，《象山先生年譜》，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7冊，1997年。

清·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清·孫奇逢，《理學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

清·梁啟超，《中國六大政治家》，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1325冊，1983年。

清·陸隴其，《陸稼書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9年。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年。

清·湯斌，《湯文正公（潛菴）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清·趙爾巽等編著，《清史稿校注》，臺北：國史館，1986年。



清·蘇楫汝，《(康熙)新會縣志》，北京：中國書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1992年。
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年。

二、近人論著（依作者姓名筆畫由少至多排序）

-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1998《臺灣人的文化觀》，臺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王崇峻 2006〈雍正文臣李紱的性情與思想〉，《鵝湖月刊》31.8：25-32。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1983《清史列傳》，臺北：中華書局。
何佑森 1995〈清代經世思潮〉，《漢學研究》13.1：1-14。
余秋雨 1995《山居筆記》，臺北：爾雅出版社。
李玉娟 2007《李穆堂與清初陸王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吳大猷 1986《教育問題》。臺北：遠流出版社。
姜義泰 2007〈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興大中文學報》22：339-370。
梁漱溟 1983《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北：里仁出版社。
張光甫 2006《教育隨筆》，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張麗珠 2005《清代新義理學》，臺北：里仁書局。
張麗珠 2010〈清代新思想典範之曙光——以陳確、唐甄、顏元為線索〉，《文與哲》16：397-440。
陳小輝 2007〈李紱年譜〉，《東華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6.4：301-308。
陳玉峰 2004〈正宗土石亂流〉，《自由時報》2004年7月11日，頁15。
黃文樹 2003《陽明後學與明中晚期教育》，臺北：師大書苑出版社。
黃進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 2010《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黃進興 1994《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楊向奎、冒懷辛 1994《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
楊朝亮 2005《李紱與〈陸子學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楊朝亮 2005〈從李紱著述看其學術取向〉，《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28-31。
潘富恩、徐洪興 2002《中國理學》，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歐陽教 1985《德育原理》，臺北：文景出版社。
錢穆 1987《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瞿海源 1988《汜濫與匱乏》，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釋印順 1994《成佛之道》，臺北：正聞出版社。

